

锡伯族古籍

盛京移驻伊犁 锡伯营镶红旗官兵

三代丁册

新疆少数民族古籍办
北京市民委古籍办

编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锡伯族古

盛京移驻伊犁 锡伯营镶红旗官兵

三代丁册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少数民族古籍办
北京市民委古籍办

编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京移驻伊犁锡伯营镶红旗官兵三代丁册/新疆少数民族古籍办北京市民委古籍办编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6

ISBN 7-228-08126-9

I. 盛… II. 新… III. 八旗兵—档案资料—中国—清代—满语、汉语、拉丁语 IV. E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2646 号

盛京移驻伊犁锡伯营镶红旗官兵三代丁册

新疆少数民族古籍办 北京市民委古籍办 编译

责任编辑 郭元儿

封面设计 王 洋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电话 0991—2825641(锡伯文编辑部)

0991—2825887(总编办公室)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刷 新疆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4.375

字数 310 千字

版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60

ISBN7-228-08126-9

定价:50.00 元

总策划 安吉志 金毓璋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永志坚 永德光 张炳宇

吴元丰 佟玉泉 屈六生

郭元儿 贺忠德 黄润华

主 编 永志坚 张炳宇

编 译 永志坚

审 读 忠 录

审 校 吴元丰 屈六生

编 务 郭元儿 李 刚

前 言

锡伯族原系我国东北古代民族之一，曾经活跃于黑龙江流域和大兴安岭一带。后来不断南迁，移居嫩江、松花江流域，开始由渔猎经济转入农业经济。明末清初，曾隶属于科尔沁蒙古。据沈阳《太平寺碑》记载：清初及以前，锡伯族居住在海拉尔东南绰尔河、洮尔河一带，这是有文献记载的锡伯族较早的活动地域。约在顺治中后期，被清政府改编为 74 个牛录，移居墨尔根、齐齐哈尔、伯都讷等地。康熙三十六年（1697）又被分三批南迁到盛京及其所属十几个城和京师驻防，锡伯族被分散到各处。乾隆二十九年（1764），为加强和巩固西北边防，清政府又从盛京及所属各城抽调锡伯官兵一千余名，连同家眷三千多人派到新疆伊犁，安置在伊犁河以南（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同先期移驻伊犁的满洲、蒙古、索伦等驻防八旗一样，建立锡伯营，执行屯垦戍边任务。这是锡伯族被编入八旗以来第一次独立建营，从此，锡伯族也被分隔成东西两部分。

锡伯营担负的任务主要有：

（一）赴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换防。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是北疆与南疆的军事要地和交通重镇，与伊犁南北相望，互为声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两处各设参赞大臣一员，驻扎重兵。塔尔巴哈台每年常驻八旗换防兵额为 1300 名，其中锡伯营官兵

130名；喀什噶尔常驻兵额为600名，其中锡伯营官兵150名。两处换防兵都是两年一换，每年换一半。这个数额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

(二) 驻守卡伦。清代在边境及各要隘设有大小卡伦80多座，派数量不等的八旗官兵驻守，其目的为防范外敌入侵，查禁越界盗贼和逃犯，保护屯所牧场。其中锡伯营驻守的卡伦有18座，近的骑马走半天就能到达，远的有几天路程。每卡派驻官一员，兵丁几个到十几个，一般住几个月到半年。光绪八年(1882)收复伊犁后，锡伯营驻守的卡伦减为9座，到光绪末年又减少到5座，官兵数额虽有减少，但驻守任务未变。

(三) 巡查布鲁特(即柯尔克孜)和哈萨克游牧地界。布鲁特和哈萨克系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逐水草而牧，散处于南北疆边界广阔地带。每年伊犁将军奏派领队大臣一员，率领满洲、锡伯、索伦三营选派的官兵前往巡查，目的是防范偷盗，查禁擅自越界放牧或开垦种田，并查收牧税。每次出行一至两月，锡伯营每年派出的官兵有60多名。

(四) 修渠屯田。锡伯营官兵“有银无粮”，口粮要自耕自给。因此，锡伯营除担负上述各项任务 and 战时奉命出征以外，还要开荒屯田。起初，锡伯营曾疏浚伊犁河南一条旧渠，引水僻田，分屯耕种。过了30多年，人口繁衍，耕地不敷，粮食供应出现困难。因此，嘉庆七年(1802)在旧渠的南边，从伊犁河开口新挖一条大渠，长二百余里，辟田千顷，分旗屯种，不仅彻底解决了粮食供应问题，也为子孙后代创立了千秋基业。因为这条大渠是在一座叫做察布查尔山的山下开的口，所以起名叫察布查尔大渠。^①

西迁伊犁的锡伯族，扎根边疆，屯垦戍边，为巩固和建设边

^① 请参见《锡伯营职官年表·前言》，吴元丰、赵志强编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防，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一百多年来，锡伯族同新疆各族人民一起，抵御外侮，平定内乱，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始终守住祖国的西大门不动摇，换来了边防的安定。察布查尔大渠的开挖，更是为加强和巩固边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渠开挖成功后，锡伯族人民又先后在博尔塔拉、塔城和巩留等地兴修水利，开荒造田，为这些地方的农业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使锡伯族人口迅速发展。充裕的人力资源，又反过来成为边防建设的坚强后盾。索伦营移驻伊犁后不到四十年，人口几乎减半，兵源告急。为此，于嘉庆三年（1798）和道光十三年（1833）分两批从锡伯营挑选 260 户共计 1279 口迁居伊犁河北岸，补充了索伦营兵力。因此，建国后那里建立了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同治战乱中，两满营官兵死伤大半，营制废弛，名存实亡。为恢复满营八旗，加强伊犁防务，光绪九年（1883）又从锡伯营挑选官兵、闲散 3185 名，连同家眷一起移驻惠远城，组建了新满营。后来，其中的一部分迁往巩留屯田，现居住在巩留的锡伯族就是他们的后裔。在同期，从索伦营前往塔城屯田的锡伯官兵，也被编入塔城新满营，现居住在塔城的锡伯族即是由由此而来的。总之，锡伯族人民为祖国的屯垦戍边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

在清代，满洲等八旗旗人的户籍、丁口编审，是一项定制，每三年编审一次。男子凡 16 岁以上（也有说 18 岁）已成丁者，都要登记入册，注明氏族、官爵等，无职业者注“闲散”。其父、兄、子、弟，兄弟之子及户下家奴均注于册，幼丁系食饷养育兵，亦要注明。册籍一式两份，由各牛录佐领、骁骑校、领催等于册籍后列名保结，然后报旗，加盖都统印信，一份上报户部，

一份留旗。这是朝廷掌握和控制旗人的一种制度，也是储备和补充八旗兵源的一种重要措施，同时也是八旗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伊犁各驻防营的编审制度如何，因资料缺乏，所以不太清楚，也未见这方面的介绍和研究文章。新近发现的《盛京移驻伊犁锡伯营镶红旗官兵三代丁册》，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这方面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这是目前在新疆发现的唯一一部很完整的驻防营旗人丁册，弥足珍贵。有清一代档案制度非常完备，锡伯营旗下档房和总管档房的各类档案都十分齐全，保存完好，虽然历经战乱，这些档案基本上都保存下来了。民国以后，由于锡伯人民仍然保持八旗制度，档案仍未受损。但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改行县制以后，八旗旧档开始被毁，包括其他一些重要古籍、文物，遭到破坏。建国以后，多次的政治运动，使流散于民间的古籍档案资料及文物古迹再次遭受破坏，“十年浩劫”中更遭灾难，已所剩无几。经过这么多的灾难浩劫，能保存下来这么一件珍贵资料，实在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成为难见的珍本、孤本。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档案馆也收藏有一册类似的资料，但残缺不全，旗分、年代也都无法知道。

《盛京移驻伊犁锡伯营镶红旗官兵三代丁册》的原文全称为《盛京移驻伊犁锡伯营镶红旗爱信泰牛录官兵闲散三代丁册》，满文手抄，宣纸装订，规格为28×25cm，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编制。册末为该牛录佐领爱信泰、骁骑校富善等十几名官弁保结并签名画押。封面及首页左下角盖有5.5cm长的正方形印章一枚，因为是复印件，字迹模糊，看不清是什么印章，估计为该佐领图记或总管关防印章。爱新泰，锡伯营镶白旗（孙扎齐牛录）人，瓜勒佳（又作瓜尔佳）氏，光绪十年（1884）三月以委笔帖式升任正蓝旗（纳达齐牛录）骁骑校，同年十月升任镶红旗（宁固齐牛录）佐领。光绪二十九年（1903）升任锡伯营副总管，一直到宣统三年清朝被推翻。富善，镶红旗人，富察（又作傅查

或付查)氏,光绪十三年(1887)以即补骁骑校实授本旗骁骑校。光绪二十四年(1898)升任正白旗(依拉齐牛录)防御,光绪二十九年休致。^①本册共登记了该旗821户旗丁,其中陈锡伯716户,新编入锡伯47户,户主已故的57户,注明在另旗入册的1户。一些由本旗调任另职的官员,人虽不在本旗,但仍然登记入册。比如,色普希贤,系该旗人,伊拉里氏,时任锡伯营总管(光绪二十七年升任锡伯营领队大臣)。又达普兴阿,吴扎拉氏,原系本旗委笔帖式,时任正黄旗(寨牛录)骁骑校。此外,光绪九年拨往惠远城新满营而后又返回来的人员,也登记入册。登记以户为单位,一丁一户,同时记录其父、祖。先记其名,次叙职衔或记功受封情况,再注陈、新锡伯或已故或阵亡情况。这是一部典型的旗人三代丁档,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反映了当时锡伯营八旗官兵的编制情况。据《锡伯营职官年表》一书综述,锡伯族于乾隆三十年(1765)自东北移驻新疆伊犁之初,一千余名官兵被编为一昂吉,昂吉设领队大臣1员,总管和副总管各1员;下编六个牛录,各设佐领、骁骑校1员,每牛录领催、披甲166或167名。乾隆三十二年(1767),增设两个牛录,扩编为完整的八旗,每旗一牛录,新增佐领、骁骑校各2员和空蓝翎4员,兵额不变,每牛录各为领催4名、披甲121名。乾隆五十七年(1792),每旗又增委官1员,空金顶8员。嘉庆十九年(1814),又将惠远城满营空蓝翎二缺移至锡伯营。道光八年(1828),锡伯营再增添甲兵300名,从中拣选前锋40名,其中选设委前锋校4员;又将锡伯营八旗分为左右两翼,每翼各设防御2员。至此,锡伯营八旗制最终确立和完善。除领队大臣、总管和副总管各1员,佐领和骁骑校各8员外,设

^① 见《锡伯营职官年表·官员履历》,吴元丰、赵志强编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有防御4员，前锋校4员，委官8员，空蓝翎6员，空金顶64员，委笔帖式2员，领催32员，前锋36员，披甲共1296名。按此编制，每旗甲兵应不少于160名，其中委官1员，领催、前锋、委领催、空金顶等员各若干，防御、前锋校、空蓝翎等员则各旗分布不匀。

兹又据光绪十三年（1887）摘抄的《伊犁各驻防营军政事宜》记载，当时锡伯营编制为：（除领队大臣以外）总管1员，副总管1员，佐领8员，防御4员，骁骑校8员，世袭云骑尉4员（其中升任副总管者1人），委官8员，（空）蓝翎6员，前锋校4员，前锋36员，领催24员，空金顶领催8员，委领催48员，兵1166名。总计官25员，甲兵1300名。与前述编制虽有些不同，但官兵总数基本相符。^① 光绪初年沙俄占领伊犁期间对锡伯人的调查报告也说，同治战乱初发时，（锡伯营）每牛录有163名官兵，战后（1871—1881）有骑兵125名，每牛录有3000多人。^② 说明锡伯营在战争中虽有损失，但每牛录仍保持有125名官兵。这个数字比较可信。

现据本《盛京移驻伊犁锡伯营镶红旗官兵三代丁册》记载，除总管和在正黄旗任骁骑校的二人不计外，该旗实有官兵为（不计已故者）：佐领、骁骑校各1员，前锋校1员，委官2员，空蓝翎1员，领催3员，委领催3员，前锋4员，笔帖式1员，委笔帖式3员，披甲77名。将前锋校以下各员20名计算在内，其总甲兵数只有97名，与上述兵额相差很大。这其中的原因，可能与光绪八年收复伊犁后重建驻防营旗制时兵源不足有关。光绪九年，从锡伯营挑选官15员、闲散壮丁3185名连同家眷一起移

^① 《伊犁各驻防营军政事宜》，光绪十三年（1887）满文手抄本，佚名撰，存新疆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

^② 见（锡伯）巴理善撰（满文）、（俄）迪亚科夫译《伊犁锡伯人关于1864—1871年伊犁地区东干——塔兰奇人暴动的回忆录》（俄文）注释（38），原文载《俄罗斯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论丛》1907年第18期，圣彼得堡出版。

驻惠远城，组建新满营时，本来就官兵缺额的锡伯营各旗，被抽调这么多的人（每旗近 400 名），其编制缺额是可想而知的。但事隔十二年，拨往新满营的人员又因各种原因纷纷返回原旗的情况下，兵额编制仍然未满足，也许另有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二）本旗丁档册在编制旗丁时，均按其东北原籍的旗籍分旗编写的。比如，该旗佐领爱新泰，原籍盛京正白旗六十一佐领下，包括他的父祖；锡伯族著名历史人物——时任锡伯营总管的色普希贤，原籍盛京所属正蓝旗舒尔吉讷佐领下，包括他的一大家族丁口，不管其父祖辈还是子孙，都被列于原籍旗下。这是伊犁驻防营关于旗籍身份资料的最新发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清代，凡八旗旗人，人随旗籍，户系于佐领，丁系于户，受到严格控制。原籍属于东北各处八旗驻防营的锡伯官兵，移驻伊犁之后重新编入新建的锡伯营，按理说，获得新的旗籍身份后，旧旗籍即应自动注销，但本册仍然保留了他们的原有旗籍，令人深思。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过去伊犁锡伯族的家谱，在其简单的序言中，也大都记述本姓人原籍为盛京及所属某城某旗某佐领下，于乾隆年间奉命移驻伊犁云云，这可能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必有原因。过去，锡伯族民间曾有传说，锡伯族被派来伊犁驻防时，乾隆皇帝曾承诺六十年一换。所以，他们的前几代祖先去世后不是棺葬，而是火化后将骨灰装坛安葬，为的是等驻防期满后便于带回原籍。但没有想到这一来就成了永久驻防，再无回期。这也许有助于从一个侧面解释保留原旗籍的原因。

（三）清初，锡伯族以编入满洲八旗的先后不同，曾有“陈满洲”、“新满洲”的不同称呼，在待遇上也有不同。在嘉、道年间，拨往索伦营的锡伯人又被称为“锡伯索伦”。光绪年间编入新满营的锡伯人则又被称为“新满洲”。这些“新满洲”，除大部分返回原旗以外，也有一部分被安排到巩留屯田，并定居在那里至今；一部分人仍留在惠远城任职当差，民国年间陆续返回原旗

或移居伊宁市，“新满洲”的称呼也就自行消失了。本旗丁档册又将锡伯人分为陈、新两种，实属罕闻，甚为新奇。更令人费解的是，同父兄弟或同祖子孙，也被分成陈、新两种。比如，阿克达春（24条），与袞楚克（20条）和祥福（23条）系同一个祖父（奇车布）的叔伯兄弟，但后二者注为陈锡伯，他却被划入新锡伯之列。又比如，森吉春（65条），与富频（59条）、富皮春（60条）、成善（61条）、英善（62条）、崇禧（63条）亦系同祖叔伯兄弟，他的兄弟们都为陈锡伯，而他独为新锡伯。编制者在册后汇总时，也明确说：原有旗丁中“陈锡伯丁699人、新编入锡伯丁47人，新满营遣回陈锡伯丁60人、新编入锡伯丁1人”，由此可知，划分陈、新锡伯，与新满营返回人员无关。究竟以什么为准分为陈、新两种，很值得研究。

（四）移驻伊犁的锡伯族有近百种姓氏，过去每一姓氏都有家谱，大多数家谱都以移居伊犁的第一代为始祖立谱。家谱有多种多样，最简单的是一张谱单，始祖居上，子孙按辈份长幼往下排列，形成金字塔形。也有的除谱单以外还有谱书，分支记载家族成员，任职当差的，还要注明其官衔、被封得奖情况。也有的同本册一样，以三代世系的形式记谱，别具一格，犹如一份家族旗丁档册。每过几年或十几年，续谱一次或重修，代代承袭，从不间断。在过去，家谱遗失或被毁的也不少，但都能从旗下档房或总管档房的本旗三代丁册中找到本家族的祖先及世系关系，得以重建新谱。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多次政治运动中，族谱被当作封建余毒，大加批判，抄没烧毁，十年“文革”中更是惨遭毁灭，幸存下来的已不多。有些家户对几代以前的祖先已记忆不清，同宗之间的辈份关系也已模糊不清，更遑论东北原籍在何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宗亲 and 家谱的重要性，开始重修家谱。有些家族根据幸存家谱的记载，找到了自己在东北的原籍，通过核对家谱，又续上了同姓宗亲，

使断绝了二百多年的亲人重新团聚，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然而，更多的人因为没有旧谱，老人的记忆又模糊，难于立谱，也无法同东北老家的亲人认宗续谱。对于原镶红旗（宁固齐牛录）的人来说，这份旗丁册无疑是一部珍贵的原始资料，为寻根认宗和重修家谱提供了方便。

尤为难得的是，本旗丁册清楚注明了该旗各户在移驻伊犁之前的东北原籍，包括有盛京（今沈阳）及其所属的辽阳、凤凰、广宁、兴京、熊岳及牛庄等七座城在内的二十多个不同佐领——原驻地，其中包括了三个蒙古佐领。这些城（镇）名称有的至今未变，比如熊岳城的镶黄旗驻防地，现在仍叫镶黄旗村。这是寻找祖籍的最可靠记载，也是寻根认宗的主要依据。

（五）西迁之初的锡伯族，按正式档案记载，官兵数额为1020人。当初编设昂吉时，分为6个牛录，每牛录为200户左右。后来增编为八旗，也是增旗不增兵额，每旗不足200户。经过140年的峥嵘岁月，经历了多少次内外战乱，尤其是刚刚经历了近二十年最残酷、最艰苦的同治战乱和沙俄占领军的殖民统治后，镶红旗一个牛录的户数仍然发展到764户，实属不易。特别是在同治战乱中，锡伯族人民几乎陷入绝境。残酷的战争使大批青壮年在疆场阵亡，以身殉国；“苏丹汗国”和沙俄侵略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又使多少人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在饥寒交迫中抛尸荒野，家破人亡，出现了不少绝嗣户，这些从本册中也可以看出一斑。但英雄的锡伯族人民并没有屈服，也没有气馁，仍然始终不渝地坚守祖国的西大门，尽忠报国，以顽强的意志和旺盛的生命力生存下来，继续发展壮大。这是一部壮烈的爱国史，是一部顽强的民族发展史。

清代锡伯族人口研究，由于资料缺乏，很难深入。本旗丁册的发现，为清代锡伯族以及整个伊犁驻防营的人口研究提供了一份难得的资料。按旗制，男子成丁登记入册后，即记为一户，至

于这一户有多少家庭成员（人口），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据嘉庆三年和道光十三年两次拨往索伦营的锡伯人口档案来看，两次挑选的都是18—23岁闲散、西丹，一人为一户。第一次拨160户，大小共计658口，户均4.1人。第二次100户，大小共计621口，户均6.2人。说明在嘉、道年间，锡伯族户均人口为4—6人。

据《筹办夷务始末》记载，同治战乱后（1871）锡伯营生存下来的大小人口为16995名，满营仅剩600余名。^①过了7年以后，根据俄国入于1877年的统计，锡伯营总人口为18321人，其中男9305人，女9016人。^②按此数字，锡伯营每牛录平均人口为2290人。经过十几年的修养生息，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人口应有一定的增长。按最低户均4口计算，镶红旗760多户总人口应不少于3000人，这比同治十年俄国人估计数差不多，但比清代满文档案记载的数字要多。当然，这里只是提出一些可供比较研究的数字和一些思路，以期引起同仁们的注意。

总之，本旗丁档册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整理出版这部资料，必定有益于锡伯族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

最后，借这部资料的出版之机，向发现并保护这部旗丁档册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工委退休干部付学先生，向特意复印保存本资料的新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原副馆长佟玉泉先生及保存复印件的新疆文联研究员忠录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遗憾的是，本册原件因辗转移手多人，不知下落。2002年，笔者曾专程去伊犁造访付学先生寻找原件，始终没有找到，实在可惜。本档册的复印本今分别由新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新疆少数民族古籍办和忠录收藏，这里根据复印本先行整理出版，以供研究者利用。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4，转引自《新疆历史资料》1983年第13辑（内部资料），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② 见（俄）潘吐索夫著《伊犁地区1871—1877年的消息》，1881年，喀山出版。转引自《伊犁锡伯人关于1864—1871年伊犁地区东干——塔兰奇人暴动的回忆录》注释（64）。

本书整理稿曾得到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吴元丰和屈六生两位研究员的细心审校，尤其是吴元丰先生提出了许多修改补充意见，这些意见在第二次修订时大都被采纳，在此深表谢忱。至于整理当中仍然存在的错误，当由编译者负责。

编译者

2003年3月25日于乌鲁木齐

凡 例

一、本书原件为 181 页，页面书写规格为 $26 \times 22\text{cm}$ ，每页 14 行，个别页码为 15 或 16 行。出于排版和阅读的需要，经技术处理后每页 14 行减少为 12 行，页数增加到 212 页，但原书的顺序及满文字体保持不变，并按增页后的实际页数编码。编辑时以原书影印部分置前，拉丁文转写和汉译文一起置后。

二、拉丁文的转写，按原文句子词序转写，即定语（职衔等）在前，主语（人名）在后。汉译文则将人名提前，职衔等置后，为汉文人名的查阅提供便利。同时，拉丁文和汉文人名用黑体字排印，以示醒目，便于查找；“陈、新锡伯”和“已故、阵亡”等拉丁文转写字，又以斜体字排印，便于区别。

三、拉丁文转写和汉文翻译时，以户为单位按序编号，两种文字为同一个编号，并将两种文版以左右对开的形式编排，便于对照阅读。

四、满文人名汉译时，一些无法表达的音采用汉字的“反切”法来处理。比如 *nendecun*，译成“讷恩德春”，其中“讷”、“恩”两字要反切；*hūwaliyabun*，译成“华利亚本”，其中“利亚”为复合音，也要反切。*Nonggišan*，则按口语的发音习惯译成“诺尼善”，等等，余不再一一说明。

五、满文人名中同名同字的不少，汉译时采用同音异字音译，以示区别，拉丁文则照原文转写不变。

六、对于原件中某些抄错的词和需要解释的术语，作了适当

校注，置于文末。

七、书末编有“人名索引”表一栏，左为拉丁文，右为汉文，各注明所在页码，相互对应，供人名检索之用。人名后所标码数，前者为满文原文本所在页，后者为拉丁文转写和汉译文所在页。

索引以一户（主）为一名，按拉丁文字母顺序排列。人名以第一次出现的页数注明页码，以后出现的则不再注明。